

莫斯科的「西爾比斯基中心」

陳 璋 津

——蘇聯迫害人權的根據地

一、前 言

蘇聯的「西爾比斯基中心」，全名是：「西爾比斯基法庭精神病檢驗中心」(Serbsky Institute for Forensic Psychiatry)，地點位於莫斯科，是蘇聯法庭精神病學研究與教學中心，也是蘇聯全國法庭精神病案件的評估中心^①。在一九七〇年代之前，西方一般人，很少知道蘇聯這個中心的內幕。一九六五年，蘇聯異議份子塔爾西斯(Vallery Tarsis)曾把他在蘇聯精神病院生活的經歷，寫成一本書，名為「第七號病房」(Ward 7)，出版於英國^②。從此，西方開始注意到蘇聯官方利用精神病學迫害蘇聯異議份子的事情，但是仍然不知道蘇聯迫害人權的根據地在何處。七二年，蘇聯異議份子弗爾平(Alexander Volpin)逃亡西方，在美國參院司法委員會為蘇聯迫害人權作證^③，大家才知道「西爾比斯基中心」在蘇聯利用精神病學迫害異議份子方面，扮演著主要的角色。

一九七六年，在蘇聯專攻藥劑學的異議份子奈基佩洛夫(Victor Nekipelov)，把他在「西爾比斯基中心」被迫害時期所探知的組織內幕，全盤在蘇聯的「自費出版」刊物揭出，於是此中心的一切黑幕，西方才全部清楚^④。

七〇年代初期，西方對蘇聯濫用精神病學指摘最激烈的時候，「西爾比斯基中心」幾乎成為衆矢之的，連蘇聯自己的精神病

註① Sidney Bloch and Peter Reddaway, *Russia's Political Hospitals: The Abuse of Psychiatry in the Soviet Union*, (London: Victor

Gollancz Ltd., 1977) p. 53.

註② See Valery Y. Tarsis, *Ward 7*, (London: Collins/Harvill, 1965).

註③ *Senate Hearing*, 27 October 1972.

註④ 奈基佩洛夫的資料二百頁，曾在蘇聯「自費出版」刊物「時事大事記」(*The Chronicle of Current Events*)第四三期，摘記發表。完整的資料，見 Nekipelov, Victor, *Institute of Poofs: Notes from Serbsky*, (New York: Farrar, Straus and Giroux, 1980).

學專家都趁機燒一把火^⑤。七一年末，蘇聯官方施加壓力，禁止蘇聯各界再批評「西爾比斯基中心」，並頒授「紅旗勞動獎章」，以鼓勵「西爾比斯基中心」的研究成就。但很顯然的，無論蘇聯國境內外，大家都知道「西爾比斯基中心」在迫害蘇聯異議份子的人權方面，是惡名昭彰了。

一、早期的「西爾比斯基中心」

「西爾比斯基中心」成立於一九二〇年，早期全名是「中央科學研究法庭精神病檢驗中心」(The Central Scientific Research Institute for Forensic Psychiatry)。一九二一年，以蘇聯當時的名精神病學專家西爾比斯基(Vladimir Serbsky)之名，改稱「西爾比斯基法庭精神病檢驗中心」，沿用至今。

「西爾比斯基中心」在編制上，隸屬於蘇聯保健部，並由保健部負責它一切工作的籌劃。不過，近年來，蘇聯異議份子發現，這只是一種障眼法的部署方式。「西爾比斯基中心」，在實質上，是由蘇聯的內政部所控制^⑥的機構，且負責蘇聯國內部份安全工作。

在四〇年代左右，大約是由哈勒斯基(Khaletsky)負責「西爾比斯基中心」第四部門(政治犯部門)的工作。至於誰是這時中心全部業務的負責人，現在的資料還不够清楚。一九四八年，蘇聯詩人柯查文(Naum Korzhavin)曾透露這個中心的管理情況。

柯查文，生於一九二五年，曾是虔誠的史大林主義信徒，却因寫諷刺詩，涉嫌「反蘇」，被關於「西爾比斯基中心」。後來，經該中心內兩個法庭精神病檢驗委員會之檢驗，判定精神正常，仍須為「反蘇」的刑事負責，致被轉徙西伯利亞放逐數年。據柯查文後來自己的敘述，他停留在「西爾比斯基中心」時，日子過得十分舒服。每天讀書，寫詩，參加治療檢驗，沒受到任何苛待。因此，他認為，「西爾比斯基中心」是相當人道的機構；至少，他能够確定，在一九四八年時，把健康的人放到精神病院中去，並不惡毒，相反地，却是慈善工作^⑦。

柯查文的說法，可能不假。在一九四八年左右，負責監督此中心的蘇聯黨工柴米利亞契卡(R. S. Zemlyachka)，在他的

註⑤ 例子，見蘇聯法庭精神病檢驗專家弗蘭克什坦(B. Frankshtein)在蘇聯雜誌「社會主義法權」(Sotsialisticheskaya Zakonnost) (Moscow, July 1971, no. 7.)所發表的論文。

註⑥ See Sidney Bloch and Peter Reddaway, *op. cit.*, p. 58, note; p. 148.

註⑦ *Ibid.*, p. 53.

監察報告中，就曾憤怒的指出：這中心已變成一所療養院，要該中心的主管「加緊一切工作」^⑧。這年，哈勒斯基的職位被換下來，改由盧塔斯（Danil R. Lunts）任第四部主管。

盧塔斯任職第四部後，作風全部改變，雷厲風行的加緊迫害政治犯。一九五五年，蘇聯異議份子皮沙略夫（Sergei Pisarev）被關在精神病院二年獲釋之後，憤恨的攻訐「西爾比斯中心」——特別是盧塔斯——的迫害惡行。

皮沙略夫，自一九二〇年起，就是共產黨黨員，多年來負責蘇聯共黨的實際行政工作。一九五三年一月，他曾向史大林呼籲，要求複查「醫生陰謀」（Doctors' plot）事件，以免 KUGB (KGB 之前身) 可能對這件陰謀造假；但他反因此獲罪^⑨。皮沙略夫被捕之後，首先被蘇聯官方利用法庭精神病檢驗辦法，送「西爾比斯中心」做精神病檢驗。經過數星期之檢驗，被確定精神失常。先被送至莫斯科布梯爾卡（Butyrka）監獄醫院精神病部門，監禁治療。四個月後，被轉送列寧格勒監獄精神病院（Leningrad Prison Psychiatric Hospital），再關一年半。五四年，列寧格勒監獄精神病院醫生卡里寧（L. A. Kalinin）鑑定他精神完全正常。五四年十二月至五五年一月，經過「岡努希金精神病研究中心」（Gannushkin Psychiatric Research Institute）再確認後，獲釋^⑩。

皮沙略夫獲釋後，五五年初即戮力於反精神病學迫害運動，矛頭指向「西爾比斯中心」。他認為，這是迫害人權的罪惡根源。皮沙略夫並向蘇聯黨中央委員會指責「西爾比斯中心」把正常人診斷為精神不正常，造成法庭強迫治療的非法案件。皮沙略夫進行反迫害運動之時，正值赫魯雪夫進行反史大林運動之際，蘇聯當局接獲皮沙略夫的申訴後，馬上組成一個委員會，由黨官庫茲涅佐夫（A. I. Kuznetsov）主持，進行調查。

庫茲涅佐夫的調查委員會，由精神病學教授和重要的精神病機構主管組成，五五年年中，就「西爾比斯中心」以及喀山和列寧格勒幾所有問題的精神病院做深入調查。五六年，委員會提出報告，證實有許多無辜的犧牲者，主要是黨的工作人員、科學家、作家和藝術家，被監禁在「特殊精神病院」之中^⑪；而且認為，蘇聯內政部干預「西爾比斯中心」的法庭精神病檢驗，造

註⑧ *Ibid.*, pp. 53-54.

註⑨ See Robert M. Slusser, "History and the Democratic Opposition," in *Dissent in the USSR: Politics, Ideology, and People*, edited by Rudolf L. Tökeš, (Baltimore and London: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, 1976), p. 340; and Harvey Fireside, *Soviet Psychoprisons*, (New York: W. W. Norton & Company, 1979), p. 38.

註⑩ See Sergei P. Pisarev, "Soviet Mental Prisons," in *Survey*, 1970, no. 77, p. 180.

註⑪ Anthony de Meeûs, *White Book on the Internment of Dissenters in Soviet Mental Hospitals*, (Brussels: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for the Defense of Human Rights in the USSR, 1974), pp. 10-11; S. P. Pisarev, *op. cit.*, p. 177.

成上述大宗政治迫害案件；同時主張應「毫無保留的解除行政調查機關的單獨控制，把管轄權完全移交給蘇聯保健部」^⑫。

庫茲涅佐夫委員會的報告上呈之後，被蘇聯黨中央委員會主管官員積壓兩年，未予公布^⑬。惟在此次調查之後，蘇聯喀山與列寧格勒的精神病院情況，的確有些改善。例如，把監獄精神病院名稱改稱特別精神病院，把犯人改稱病人，使真正患有精神病的病人，得到較好的診治^⑭。被發現有濫用法庭精神病檢驗做政治迫害的「西爾比斯基中心」，也加添了新完成訓練的精神病專家，以抵制不正當的診斷。從表面看，蘇聯當局似乎願意承認並改正以前的錯誤，但是另一方面，事情並非如此。一九五八年，在庫茲涅佐夫調查委員會的報告被積壓了兩年之後，這個認真工作的調查委員會，由於暴露太多非法情事，其有關工作人員（包括庫茲涅佐夫在內），全部被庫茲涅佐夫的頂頭上司祖拉也夫（V. M. Churayev）撤除其在中央委員會的職位。進行非法政治迫害的「西爾比斯基中心」，並沒在實質上再劃歸蘇聯保健部管轄。連執行非法迫害的精神病學專家，都沒受到起碼的處分，或調職撤查。進行迫害的禍首盧塔斯，在「西爾比斯基中心」還獲得升遷^⑮。

五八年後，蘇聯當局再增設數所同類型的精神病院，以輔助「西爾比斯基中心」的工作。五五——五六年的調查，並沒有影響蘇聯內政部控制蘇聯各地監獄精神病院的權力。六〇年代中，蘇聯內政部的機關報「走向新生活」（*Towards a New Life*），即已承認 KGB 直接控制了這些精神病院^⑯。因此，整個以「西爾比斯基中心」為首的精神病學迫害系統，在赫魯雪夫時代顯然已完整地建立了起來。

三、內部組織與人事

對於「西爾比斯基中心」的內幕與人事，在六〇年代，即使在那裏面受過政治迫害的蘇聯異議份子，都不十分清楚。原因之一，是負責檢驗的幾個首腦人物，很少露面。曾經接受精神病檢驗的異議份子，在檢驗過程中，跟盧塔斯這類高級人員打照面的機會不會超過兩次。一般異議份子對盧塔斯較為熟悉，其他細節及人事，就不知道了。

七六年，奈基佩洛夫供出的「西爾比斯基中心」之內幕，至目前為止，成了西方最有價值的研究資料。

註⑫ Peter Reddaway, *Uncensored Russia*, (New York: McGraw-Hill, 1972), pp. 232-233.

註⑬ *Ibid.*, p. 233; S. Bloch and P. Reddaway, *op. cit.*, p. 60.

註⑭ See *Prisoners of Conscience in the USSR: Their Treatment and Conditions*, (London: Amnesty International 1975), pp. 125-126.

註⑮ Harvey Fireside, *op. cit.*, p. 38.

註⑯ Peter Reddaway, *op. cit.*, p. 234.

奈基佩洛夫，生於一九二八年，是蘇聯的藥劑學專家與文學家。他在六〇年代中，曾出版有「火星與金星之間」(*Between Mars and Venus*)詩集。一九七三年七月，因參加「自費出版」活動，在弗拉第米爾地區的卡美薛科瓦(Kameshkovovo)小鎮被捕^②；奈基佩洛夫本人也是蘇聯民主運動中「捍衛人權行動團體」(Action Group for the Defence of Human Rights)之成員。同年，奈基佩洛夫依俄羅斯共和國刑法第一九〇——一條被控。七四年一月，蘇聯 KGB 利用法庭精神病檢驗辦法，送他進「西爾比斯基中心」檢驗精神狀況。結果，因這時西方抗議蘇聯濫用精神病學，他被檢驗為精神正常，須負刑責。隨後，被判關奴工營兩年。七六年，他獲釋後，以「自費出版」刊物方式，出版「愚人的中心：西爾比斯基中心筆記」(*Institute of Fools Notes: on the Serbsky Institute*)，抖出「西爾比斯基中心」全部內幕^③。

「愚人的中心」一書之資料，部份根據奈基佩洛夫本人在「西爾比斯基中心」期間所記下的日記，部份根據他精確的記憶，少部份是其他異議份子的報告。

根據奈基佩洛夫所提的資料，「西爾比斯基中心」表面上是歸「保健部」管轄，可是實際上是受蘇聯內政部所控制。他相信，「西爾比斯基中心」的全部人員，都是身負軍職的 MVD 份子。醫生是軍官身份，而護士和護理員都是士官或士兵。走廊的安全警衛，也是身兼軍職的人員。著名的盧塔斯，在一九七四年已是陸軍少將；而且，也是蘇聯內政部的工作人員^④。另外，據逃離蘇聯的前「西爾比斯基中心」部門主管和「全蘇聯神經學家與精神病學家協會」書記若維可夫(Yury Novikov)供稱，經常與蘇聯 KGB 保持聯繫的中心人員，盧塔斯是其中的一個^⑤；由此，可知他的身份。

「西爾比斯基中心」共分七個部門。中心主任，根據已知資料，一九五〇——五一年間，一度曾由史內茲內夫斯基(Andrei Snezhnevsky)擔任；五二——五七年間，職位虛懸；五七年，改由莫洛佐夫(Georg Morozov)擔任至今。

史內茲內夫斯基，生於一九〇四年，是當代蘇聯精神病學最具權威的人士。現擔任蘇聯「醫學院精神病研究中心」(AMS)主任，有院士的頭銜。歷任：AMS 專任研究員、蘇聯保健部顧問、「世界精神病學協會」榮譽會員、「美國精神病協會」榮譽會員和英國「皇家精神病專家學院」榮譽校友。他參與過檢驗普留希契(Leonid Plyushch)和梅得維捷夫案件。

註② See *A Chronicle of Current Events*, no. 28, (31 December 1972), pp. 76-77; *A Chronicle of Current Events*, no. 32, (17 July 1974) pp. 17-18.

註③ S. Bloch and P. Reddaway, *op. cit.*, p. 147.

註④ *Ibid.*, p. 148.

註⑤ H. Fireside, *op. cit.*, pp. 85-86. 亦請參閱 Amnesty International Report on Torture, (London: Amnesty International Publications, 1975), p. 188; Aleksandr Podrabinek, "Punitive Medicine: A Summary", in Harvey Fireside, *op. cit.*, p. 140.

莫洛佐夫，生於一九二〇年，現任「西爾比斯基中心」主任。自一九七四年起，他成為蘇聯「醫學院精神病病研究中心」的終身研究員，而從七五年起，他任「全蘇聯協會」(All-Union Society)主席團主席迄今。以他在「西爾比斯基中心」的地位，他對全蘇聯的法庭精神病檢驗，有相當大的影響力。莫洛佐夫的名字，經常與精神病學政治應用的控訴案件一起出現。他參加過下列對蘇聯異議份子的法庭精神病檢驗：格里郭倫柯(Pyotr G. Grigorenko)、郭邦尼夫斯卡婭(Natalya Gorbanevskaya)、梅得維捷夫和懷恩堡(Viktor I. Fainberg)等案件。他和盧塔斯一樣，也成為西方譴責的焦點。

「西爾比斯基中心」主任底下的七個部，以第四部的問題最大，它關押政治犯和某種類型的精神病犯；第七部關押酗酒病犯，第五部關婦女，第一、二、三和六部，專門關其他類型的精神病犯。此中心另外設有大教室，作為法律系與醫學系的學生上課與討論之用。這七個部中，以第一、二部最大，第一部可容一百多個病犯。估計在一九七四年，「西爾比斯基中心」曾關有三百多個病犯^②。

問題最大的第四部，從一九四八年起至七七年止，曾由盧塔斯任主管。

盧塔斯，一九一一年出生，一九三〇年代任職高爾基主要監獄醫院部精神病科。以後，調職到「西爾比斯基中心」，四〇年成為高級研究員，四八年任此中心第四部主管。五〇年代，他躲過蘇聯的反猶太主義鬭爭，但職位一直不穩，到五七年，莫洛佐夫調升「西爾比斯基中心」主任後，他的職位才穩下來。歷年，受他迫害過的異議份子，計有：辛雅夫斯基(Andrei Sinavsky)、弗爾平、格里郭倫柯、郭邦尼夫斯卡婭、雅基莫維奇(Ivan A. Yakimovich)、懷恩堡、布柯夫斯基(Vladimir K. Bukovsky)和邢漢諾維奇(Yury A. Shikhanovich)等人^③。

一九七七年三月，主管第四部的盧塔斯，於任內逝世。第四部的主管，改由塔爾塞(Margarita F. Taltse)繼任^④。第四部的副主管，是蘭道(Yakov L. Landau)^⑤，主治醫師是米爾揚克辛(Gennady N. Milyokhin)。其他在第四部的醫生，根據奈基佩洛夫的資料，計有塔巴科娃(Lyubov I. Tabakova)、亞查瑪托夫(Alfred A. Azamatov)、弗金(Albert A. Fokin)和捷拉希莫娃(Svetlana Makarova Gerasimova)等人，他們均具有博士學位。

曾為盧塔斯掌管的第四部，現稱「特別診療部」。這個部共有三十四張床位，分置於六間病房內。其中，有三間分置十張床位，專門拘禁被控犯政治性或刑事罪行最危險的犯人。這三間房間被人戲稱「箱子」，配置特別警衛，自成格局。可是犯人不管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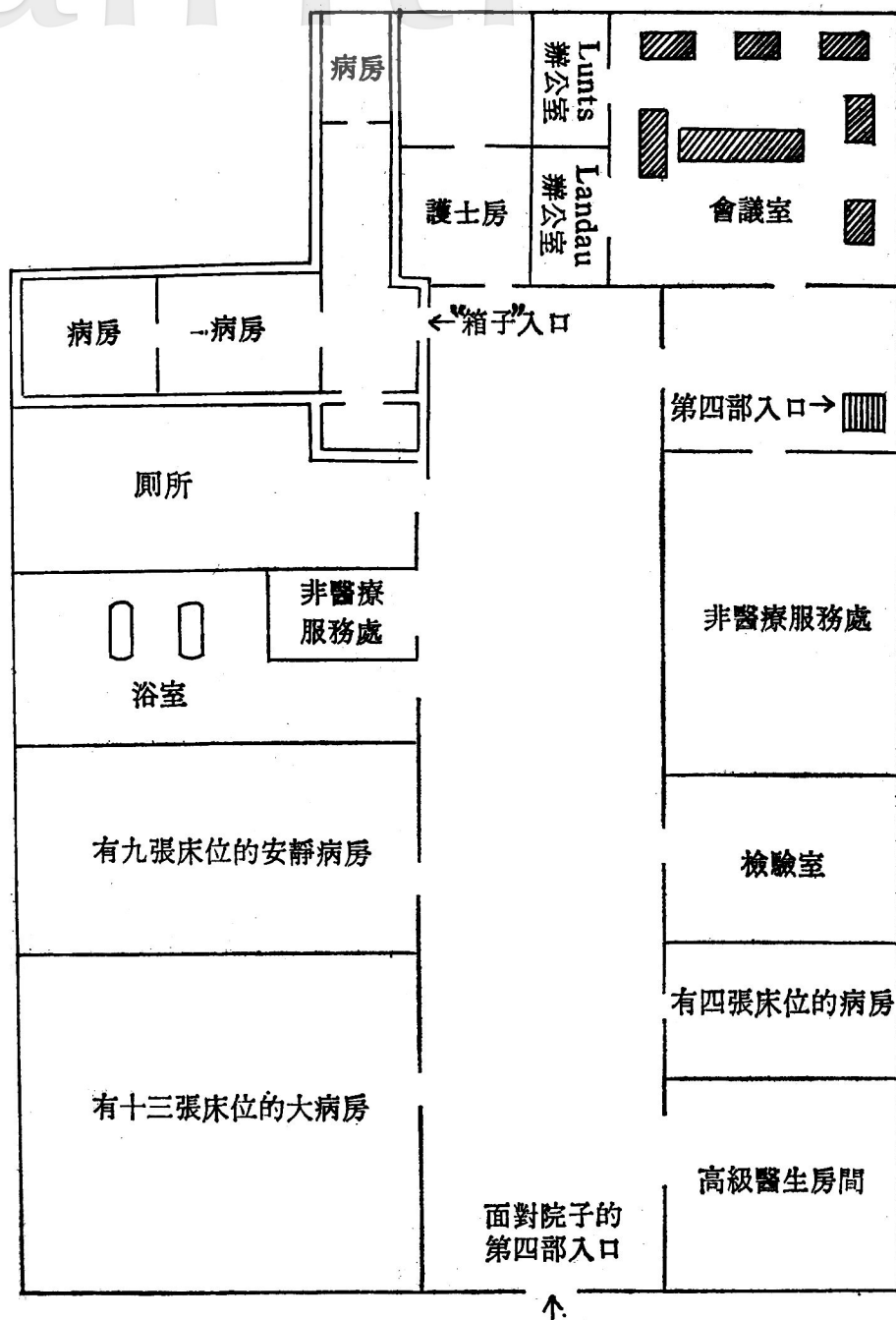
註② S. Bloch and P. Reddaway, *op. cit.*, p. 148.

註③ S. Bloch and P. Reddaway, *op. cit.*, p. 225-226; P. Reddaway, *op. cit.*, p. 236.

註④ Aleksandr Podrabinek, *op. cit.*, p. 140; H. Fireside, *op. cit.*, p. 86.

註⑤ H. Fireside, *op. cit.*, p. 86. 奈基佩洛夫的資料可能有錯。這裏的說法，根據蘇聯前「西爾比斯基中心」某部門主管若維可夫的資料。見 Yury Novikov, "Kronzeuge gegen den KGB," in *Der Stern*, no. 14, 1978, p. 156.

是在那種房間，活動都相當的自由。其他房間，共有二十四張床位，是為停留一個月的普通犯人而備的，不過有時也關政治犯。詳細情形，見圖示：



西爾比斯基中心第四部的配置圖表

1974, as drawn by Viktor Nekipelov

資料取自：S. Bloch and P. Reddaway, 《Russia's Political Hospital》 (London, 1977), p. 149

依奈基佩洛夫的敘述，「西爾比斯基中心」的設備與研究，水準並不高，但是犯人一般的情況均很好。房間乾淨，食物可口而量多，床有床單，包裹一星期可寄進去一次。許多犯人，除政治犯外，均可與親友會晤，只是吸不到新鮮空氣而已。

「西爾比斯基中心」的犯人，都有過被「真理」藥物注射的經驗，在注射當時，旁邊還有醫生在詢問，甚至有時女性醫生做性的試探。醫生們也會用藥物，來懲罰不聽話的犯人。

「西爾比斯基中心」的精神病醫生，大部份時間都在違反精神正常的異議份子意志的情況下，證明他們精神不正常。而少部份的時間，則在阻止一般的犯人變成精神不正常，以防他們利用這點，而免掉集中營的刑罰或死刑。依莫洛佐夫的說法，通常從全國送到法庭的最奇特、最難判決的案件，都送到「西爾比斯基中心」來。據他估計，所有病犯不必為他們的罪嫌負責的，全部不到百分之十五。可是，他結論說，在處理異議份子時，醫生們在意識上是違反倫理的。他們的動機，大部份是追求名利的心理在作祟，完全盲目屈從，沒有職業良心。

四、迫害異議份子的著名案例

「西爾比斯基中心」自盧塔斯掌管第四部後，所迫害的精神健康之異議份子，不在少數。儘管在五〇年代有皮沙略夫的控告，六〇年代有異議的蘇聯精神病學專家從內部反對²⁶，可是迫害的作風依舊。七〇年代，蘇聯在西方輿論的壓力下，曾釋放一些關在精神病院的政治犯，例如，懷恩堡和普留希契等人，不過暗地裏還是透過「西爾比斯基中心」，迫害一些西方較不知道的蘇聯異議份子。八〇年五月，雷大衛（Peter Reddaway）在倫敦「泰晤士報」（*The Times*）上報導，蘇聯仍然是照樣把為數近兩百名的異議份子，運用長期拘禁或關入瘋人院的辦法，加以迫害²⁷。下面，是歷年來，幾個受「西爾比斯基中心」法庭精神病檢驗迫害的著名案例。

（一）布柯夫斯基

註²⁸ *Ibid.*, pp. 234-242.

註²⁹ Peter Reddaway, "Dissidents of long Standing are arrested in KGB's purge before Olympics," in *The Times* (London) May 7, 1980.

一九七九年十一月，國際特赦組織曾發表公報，臚列了二十名蘇聯異議份子在七八年十一月至七九年十一月之間，受精神病學政治濫用迫害的詳細資料。在八〇年四月末，又接獲十八件新案例。其中著名的有：烏克蘭新聞界人士蘇科巧克（Pavlo Skochok）和立陶宛人權運動者契漢納維休斯（Arvidas Chekanavichius）等人。見 *Amnesty International Report 1980*, (England: Amnesty International Publications, 1980), p. 305.

莫斯科的「西爾比斯基中心」

生平資料：布柯夫斯基，生於一九四二年，是批評家與政論家。布柯夫斯基早年大概與蘇聯「自費出版」物「芬尼克斯」(Feniks) (一九六一)有往來，也曾替蘇聯地下組織「史莫格」(SMOG)工作過。根據蘇聯的資料來源，布柯夫斯基曾寫過一篇論文，試圖證明共產主義青年團並不存在。一九六一年，當布柯夫斯基在學的最後一年，因主編地下期刊「烈士」(Muchenik)，學校當局找他麻煩，同時被開除學籍。後來，他進莫斯科大學農學院，六二年，被教育當局發覺，再度開除。六三年，他因散發「反蘇刊物」，被捕^②。

被迫害案情：六三年，在未由蘇聯法庭審理之前，布柯夫斯基被檢方送往「西爾比斯基中心」做精神病檢驗，被認定有「呆滯性精神分裂症」，而轉送列寧格勒精神病院做「特別治療」。十五個月後，他獲釋。六五年十二月因欲參加蘇聯「憲法節」示威，再度被捕；又被「西爾比斯基中心」診斷為精神不正常，被關進精神病院。六六年末，再度獲釋。六七年元月，他參加示威，三度被捕。在法庭審判之前，他仍受「西爾比斯基中心」精神病檢驗，但此次出乎意料之外，被宣佈為精神健全，確定該為刑事負責。布柯夫斯基第三次能自精神病院提早獲釋，據說是因西方記者的壓力。七八年，布柯夫斯基回憶他以前被確認為精神不正常的原因，是因為蘇聯精神病學專家認為，他把蘇聯的法律看得太過於認真了^③，因而被判定為精神不正常。

近年活動：七〇年，布柯夫斯基獲釋後，因積極向西方揭發蘇聯濫用精神病學的惡行，曾於七一年四度被捕。七六年十二月，西方以他與智利共黨頭子柯爾瓦蘭(Luis Corvalán)交換，因得逃出蘇聯。在西方的布柯夫斯基，積極的協助蘇聯境內的異議份子避開精神病學的迫害。七八年，他出版自傳「蓋座城堡」(To Build a Castle: My Life as a Dissenter)，說明他的異議生活。

(一) 郭邦尼夫斯卡婭

生平資料：郭邦尼夫斯卡婭，生於一九三六年。在赫魯雪夫統治初期，進莫斯科大學修讀語言學。五六年左右，捲入學生政治活動的是非圈中，被傳到莫斯科盧比揚卡監獄中審訊；因透露學生政治活動內幕，獲釋，但從此陷入情緒不安的心理狀態。五九年，自動進卡邢柯醫院(Kashchenko hospital)接受精神病檢驗；被斷定有精神分裂症。治療一年後，即出院，而於地方精神病診所繼續診治；不久，被認為病症痊癒。六三年，她畢業於列寧格勒大學，同年，任蘇聯「國家實驗設計和技術研究中心」翻譯員，並任一雜誌的主編。

註② See Cornelia Gerstenmaier, *The Voices of the Silent*, (New York: Hart Publishing Co., 1972), pp. 138-139.

註③ See Joshua Rubenstein, *Soviet Dissidents: Their Struggle for Human Rights*, (Boston: Beacon Press, 1980), p. 36.

郭邦尼夫斯卡婭很早就參加蘇聯的「自費出版」運動。在莫斯科大學時期，她曾把詩投交「自費出版」雜誌「芬尼克斯——一九六一」發表。隨後在格蘭斯可夫（Yuri Galanskov）引介下，認識金茲堡（Alexander Ginzburg），並於六〇年在金茲堡被捕後，還接替他編「自費出版」刊物「辛塔克斯」（Syntax）。在六〇年代中，郭更是積極參加人權運動。

被迫害案情：一九六八年元月，格蘭斯可夫和金茲堡受審，郭邦尼夫斯卡婭和其他三十名蘇聯市民，寫抗議信抗議，KGB開始密切注意郭的活動。同年八月，郭參加「紅場示威」（Red Square demonstration），十一天後，被送往「西爾比斯基中心」作精神病檢驗，理由是郭曾患有精神病，兩次進卡邢柯醫院。由盧塔斯所主持的精神病檢驗委員會，檢驗郭邦尼夫斯卡婭的病情結果，認為她患有「嚴重的精神變態」，而且可能有呆滯性的精神分裂症；建議法庭把她放進特殊精神病院，做強制的治療^{②①}。但是「西爾比斯基中心」的迫害未果，檢察官斥回郭邦尼夫斯卡婭，並交由她母親看管。

郭邦尼夫斯卡婭獲釋後，仍然不遺餘力的進行異議活動。這時，她開始編纂紅場示威之記錄，以及共同示威者受審的資料。六九年末，她在「自費出版」物上發表題名為「中午的紅場」（Red Square at Noon）^{②②}。同年五月，她還參加「捍衛人權行動團體」（Action Group for the Defence of Human Rights），抗議蘇軍入侵捷克。郭參加異議活動的結果，是遭到另一次的政治迫害。六九年十二月，郭邦尼夫斯卡婭被捕，翌年四月，送「西爾比斯基中心」再次接受精神病檢驗。這回盧塔斯與莫洛佐夫主持的檢驗委員會，斷定她是患有「呆滯性的精神分裂症」。委員會根據的理由之一，是她對她自己政治信仰的評判觀點，反映出她缺少批評的能力。其次，委員會認為，郭不放棄她的活動，而自認她所做的沒有一件違法，這便表明她根本迷亂的不清楚她所做的事，在性質上是犯罪行為^{②③}。因此，此委員會建議，她不能為刑事負責任，須送特殊精神病院做強迫治療。

一九七〇年七月，莫斯科市法庭舉行對郭邦尼夫斯卡婭的審判，結果判定郭有罪；但因她被斷定喪失行為能力，不能為行為負責，故又決定接受「西爾比斯基中心」的檢驗委員會之建議，送郭進特殊精神病院，做無限期的強迫治療。郭邦尼夫斯卡婭在七一年一月，被送往喀山特殊精神病院治療，七一年十月轉送「西爾比斯基中心」，七二年二月，因西方的壓力與輿論指責，獲釋。郭在精神病院中，由於長期服用藥物，無法集中精神寫作^{②④}。

近年活動：郭邦尼夫斯卡婭在獲釋後，還從事異議的活動，但不直接參與。七五年十二月十八日，她獲准移居國外。雖然蘇聯曾給她難堪，發給入以色列的簽證，不過她和她兩個兒子還是順利的移居維也納。近年，她定居巴黎，參加俄國流亡份子的刊

註②① *Ibid.*, p. 105; S. Bloch and P. Reddaway, *op. cit.*, pp. 131-132.

註②② 「中午的紅場」已於西方出版—見 Natalia Gorbanevskaya, *Red Square at Noon*, (New York: Holt, Rinehart and Winston, 1972).

註②③ S. Bloch and P. Reddaway, *op. cit.*, p. 135.

註②④ Ludmilla Thorne, "Inside Russia's Psychiatric Jails," in *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*, (June 12, 1977), pp. 27, 30.

物「大陸」雜誌之編輯工作。她繼續不斷的密切注意蘇聯違反人權的問題，也時常關心她的難友們在蘇聯監獄、勞改營和精神病院中，仍然過着的苦難生活。

(三) 懷恩堡

生平資料：懷恩堡，生於一九三一年，是蘇聯一家工廠的裝配工。他曾在這家工廠工作至一九六八年，到他完成大學課業為止。六八年，他畢業於列寧格勒大學語文系英文組，畢業後，在巴甫洛夫斯基宮 (Pavlovsk) 博物館當導遊人員。六八年「紅場示威」發生時，他仍是此處的導遊人員^{註②}。

被迫害案情：一九六八年八月，懷恩堡參加反對蘇聯入侵捷克的「紅場示威」，被趕來鎮壓的軍人施暴打落四顆前排的牙齒，但由於被認定已違反公共秩序，應予起訴，可是又由於被毆打的太厲害，不能讓他出庭，於是蘇聯當局決定把他送交法庭精神病檢驗，讓他不能出庭辯解^{註③}。因此，在「懷疑他有精神病」的理由下，懷恩堡被送往「西爾比斯中心」檢驗。

根據一九六八年十月，盧塔斯、莫洛佐夫與蘭道組成的法庭精神病檢驗委員會之報告，懷恩堡患有後精神病分裂症型的心理變態^{註④}，主要症狀是他具有「改革主義的熱誠，以及堅信他的政治觀點是正當無誤的」。顯然他被認定是精神不正常，是由於他的異議觀點^{註⑤}。同年十二月，蘇聯法庭採用「西爾比斯中心」的建議，送懷恩堡到列寧格勒特殊精神病院做無限期治療。

懷恩堡在六九年，被送往列寧格勒。七〇年七月，向世界捍衛人權組織寫長信，控訴蘇聯精神病院醫生們的惡行^{註⑥}；七一年春，爲了抗議醫院的虐待，曾進行長期饑餓示威。

近年活動：懷恩堡在一九七三年十一月獲釋，在七四年四月一度與皮姆 (Perm) 集中營的政治犯聯合進行饑餓示威，又被捕。五月，曾威脅要自殺，醫院當局怕出命案，立即釋放他。懷恩堡在七四年春，獲准攜帶往以色列的出境簽證，移居國外。他隨即定居倫敦。目前的工作是作環球旅行演講，控告蘇聯把政治犯囚禁於精神病院的惡行。

註② N. Gorbanevskaya, *op. cit.*, p. 265.

註③ 這是郭邦尼夫斯卡婭一九七二年九月，在美國參院司法委員會的書面證詞，見 U. S. Senate, Committee on the Judiciary, *Abuse of Psychiatry for Political Repression in the Soviet Union*, I. (Sept. 26, 1972) p. 135. 亦請參閱 L. Thorne, *op. cit.*, p. 30; H. Fireside, *op. cit.*, p. 79.

註④ Paul Chodoff, "Involuntary Hospitalization of Political Dissenters in the Soviet Union," in *Psychiatric Opinion*, (Feb. 1974), p. 8.

註⑤ H. Fireside, *op. cit.*, p. 80.

註⑥ 懷恩堡的長信，原文見 *A Chronicle of Current Events*, no. 17, (Dec. 31st, 1970)。內容摘記，見 P. Reddaway, *Uncensored Russia*, pp. 86-87.

歷年來，除了上述諸人曾受蘇聯「西爾比斯基中心」迫害之外，其他如；格里郭倫柯、弗爾平、瑪青柯、辛雅夫斯基等案件，也是有名的被此中心迫害案件，在此不再贅述。

五、反迫害與人類的自覺

一九七五年，國際特赦組織曾在「關於酷刑的報告」(Report on Torture)裏頭，報告「西爾比斯基中心」在迫害蘇聯異議份子方面所擔任的角色^③。在歷年的年度報告中，也曾多次提到被此中心迫害的蘇聯異議份子。該組織在英文版的「時事大事記」中，每期更是臚列這類迫害人權的消息。可是世界輿論的反響與譴責，似乎並不足夠。正如雷大衛與布洛赫(Sidney Bloch)所言：環球新聞界所重視的，只是新聞價值的問題，他們不在意這些迫害是否違反人道^④，因此，對蘇聯當局的影响不大。蘇聯當局每每利用西方輿論雷大雨小、決心不定的作風，做適當的政策調整。所以，迫害異議份子的「西爾比斯基中心」，還是能够繼續施行法庭精神病檢驗的手法，迫害人權。

運用美國政府的壓力，來進行人權的反迫害，過去四年來，也證明是失敗的。蘇聯當局十分清楚美國政府的人權外交政策，決不是真正關心人權問題，而只照顧自己的國家利益，因此，克宮的作法也就依然故我。八〇年初，在莫斯科奧林匹克大會舉行之前，蘇聯大量拘捕蘇聯異議份子，徹底運用「西爾比斯基中心」做政治迫害，也明白顯示蘇聯官方知道西方的弱點。

對「西爾比斯基中心」進行反迫害，作法上較有用的，似乎是靠蘇聯異議份子自己了。過去十年來，蘇聯異議份子們從被迫害的經驗中，取得教訓：知道只要積極努力引起西方一點點注意力——那怕是一時的——就能自救。所以，從布柯夫斯基到近年的波得拉比納基(Aleksandr Podrabinek)，都是努力的朝這個方向走。當然，這些反迫害的自救手法，都是事後的補救，而且，工作相當困難。一九七四年，布柯夫斯基與精神病學專家格魯茲曼(Semyon Gluzman)出版「異議份子精神病學手冊」(A Manual on Psychiatry for Dissenters)，提供異議份子另一種反迫害的策略，也就是告訴他們，在受法庭精神病委員會檢驗當時，要與專家們合作，而免受更大的迫害。布柯夫斯基等的策略，較為積極，屬於事前的補救辦法。不過，這種策略，有用的程度有多大，也還是值得懷疑。因為蘇聯 KGB 在決定不讓一個蘇聯異議份子進行活動，而強迫他接受法庭精神病檢驗時，其不受迫害的機會，已經不大。除非他碰到有職業良心的精神病專家，否則，在任何事情都可能發生的蘇聯社會，他不受迫害

註③ Amnesty International Report on Torture, p. 188.

註④ S. Bloch and P. Reddaway, op. cit., p. 342.

的可能性便更小了。

無論如何，蘇聯「西爾比斯中心」的存在，對資本主義社會或社會主義社會，多少都是一種諷刺。生活在聲稱有「社會主義民主」的蘇聯社會裏，連認真遵守這個社會的體制，實行人權的基本要求，發揮人類的自覺，都要被判定為精神不正常；那麼對於生活在這一體制下不辨是非、顛倒價值的人，不知應如何判定了。難怪布柯夫斯基在受法庭精神病檢驗時，都懷疑他是生活在卡夫卡（Kafka）小說的世界中。更可悲的事，西方對「西爾比斯中心」進行政治迫害，把精神正常的人判定為不正常的不人道行為，居然只以新聞價值或者政治利益的眼光，加以看待。那麼，西方人的精神是否仍然正常，倒也值得懷疑。就蘇聯「西爾比斯中心」而言，目前任何一種反迫害的手法，都是屬於消極性質。如果不澈底剷除這所中心所賴以設立和經營的整個制度，則蘇聯人民將永遠沒有辦法從被迫害的人權中解脫出來。同時，西方姑息、容忍與忽視此種惡行，亦難免自食惡果。

立法委員
國際問題專家 鄧公玄先生遺著

「浮漚掠影」業已出版開始發售

本中心前副主任兼本刊主編故立委鄧公玄先生，為我國有數國際問題專家之一，著有「國際論文選」、「今日之歐洲」、「國際公法與國際關係」等書，鄧氏逝世後，由其夫人張近淑女士以一年餘時間，整理遺稿，完成「浮漚掠影」一書，內容除鄧氏一生從政歷史外，尚有詩稿遺墨，自訂年譜及生活相片等，全書四十餘萬言，六〇〇餘頁印刷精美。

25 開本 每冊實售 新臺幣二〇〇元（郵資另加）

經銷處

三民書局 世界書局 臺北市重慶南路1段
中外雜誌社 臺北市新生南路3段7號之2（2樓）